

中國 儒學史



赵吉惠 郭厚安 主编
赵馥洁 潘 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國 儒學史



趙吉惠 郭厚安
趙馥洁 潘 策 主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中国儒学史

赵吉惠 赵馥洁 主编
郭厚安 潘 策

责任编辑 王 昕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郑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7.75 印张 671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8000 册

ISBN 7-5348-0425-6/K·91 定价 19.50 元



赵吉惠，满族，1934年生，黑龙江省宁安县人。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历史学概论》、《中国先秦思想史》、《中国儒学辞典》（主编）。



郭厚安，四川彭山人，1926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述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儒学辞典》（主编之一）、《甘肃古代史》（主编）。



赵馥洁，194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陕西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墨子》、《道的历程》、《庄子思维方式的特征》等四十余篇论文。



潘 策 1929年生，四川省岳池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秦汉史教学与科研工作，撰有《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的土地制度》等有关秦汉史论文多篇，并为《中国儒学辞典》一书编委。

《中國儒學史》提要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近年來又形成世界性的“儒學熱”。在日本和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歐洲、美洲等經濟發達地區，學者們企圖用儒家倫理調整和解決“後工業化”出現的社會問題。《中國儒學史》系國內外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儒學發生、發展和演變史的專著。全書分爲：先秦時期儒學的形成和初步發展、兩漢時期儒學的經學化、魏晉時期儒學的玄學化和宋元明清時期儒學的理學化、儒學的漸趨衰頹等五編。本書以儒學的演變與歷史形態爲主線，以文化史爲背景，突出學術史，以史學主體與客體相統一爲方法論原則，概括了國內外儒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豐富的史料論述儒學對於奠定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團結與凝聚各民族的向心力等方面的地位與作用。

11481-2
01

《中國儒學史》について

儒學は中國の伝統的な文化の主體として、この數年らい世界にわろつて儒學ブームにをっている。日本、東南　シア、太平洋地區には儒教文化圏になったり、歐美などの經濟発達している地區の學者ちわは儒家の倫理にさてづいて、工業化よわたちとて癸生わちた社會問題の調整・解決なしようと考元ら水る。國內外からみるて、本書は全面的に系統的に儒學の癸生・癸展および進化史な述べるのは始るての専門著作であると思う。全書に大別して先秦（春秋戰國時代）時期における儒學の形成および癸展、兩漢時期における儒學の經學化、魏晉時期における儒學の玄學化および宋元明清時期における儒學の理學化、儒學の衰えることなどの五編からなっている。

本書な儒學の進化と歴史形態を基調として、文化史な背景にして、特に學術史を突出して、史學の主體と客體の統一の方法論を原則として、國內外における儒學研究の新しい成果をまとめたのである。更に豊富な史料を蒐集して、儒學が中國の伝統的な文化を定めて癸展すること、共同の民族心理結構と思維方式の形成、各民族を團結しようとの求心力をでに對して、その地位と作用を述べたのである。伝統の觀點を突破したところが多く、文章のきまりにも獨創的な見解があり、史料を吟味しながら、穿ちほるところがある。本書は流暢な言葉で書いたもので、そかりやすくて玄く一般社會の方々の利用を期待する次第である。

引 言

儒学研究不但是国内学术界相对常新的课题,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新中国诞生以来,国内学术界、思想界研究儒学或孔子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是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是以批判为主,以继承为辅的评价孔子时期。在这个时期,虽然有的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对孔子及儒学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分析态度,也做出过一些成绩,但是,就全社会的主要学术潮流来看,对待孔子主要是批判,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简单化,有的甚至是很粗暴的;二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这是全面否定孔子、批判孔子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提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口号,把“尊孔”与“批孔”的历史概念视为政治问题,完全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际上是取消了对于孔子的科学研究与客观评价;三是70年代后期至今天,即十年浩劫结束以来的时期,这是以冷静下来的头脑与科学方法深入研究孔子,重新评价孔子的时期。这个时期儒学研究表现出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第一,研究的范围拓宽,研究者队伍空前壮大。其中不但有史学、哲学、教育、文学、美学工作者,还有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工作。在这一时期,国家与政府对儒学研究给予了关注和支持。1984年在山东曲阜成立了“孔子基金会”,198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孔子研究所等群众性学术团体,1986年孔子基金会出版了专业性杂志《孔子研究》,中华孔子研究所出版了《研究通讯》。第二,研

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较前有明显的进展,在研究方法方面克服了过去一元化、简单化的倾向,出现了群芳争艳、各领风骚的可喜局面。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把儒学与文化史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把儒学研究 with 总结传统文化优秀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现代化等当代最为人们关注的课题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明确了研究儒学的目的与方法。第三,研究成果突出。在这个时期出版的研究儒学的专著有: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198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匡亚明的《孔子评传》(1985 年齐鲁书社),杜任之、高树帜的《孔子学说精华体系》(1985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韩达编的《评孔纪年》(1985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1984—1987 年人民出版社),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近年来在国内还出版了钱穆的《论语新解》、《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又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曾经多次再版。此外,这个时期在全国各种学术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以万计的研究儒学的论文,其中有的已经汇编成论文集出版,如《孔子研究论文集》、《孔子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孟子思想研究论文集》等。齐鲁书社还出版了《孔子研究论文著作目录》(1949—1986),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杨焕英编著)。第四,由对儒学的专题研究,转向全面、系统研究,研究儒学演变、发展的历史,全面、系统地评价孔子与儒学的历史地位。1987 年 8 月在曲阜召开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儒学及其演变与影响”,已经发表了数篇关于“儒学演变”的学术论文。1989 年 10 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联合举行“孔子诞辰 2540 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以“孔子、儒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代影响”为中心议题。我们认为应该在总结近年来研究儒学新进展的基

基础上,写出全面、系统的阐述儒学演变历史的论著。第五,研究儒学超越了民族、地区与国界,成为国际性学术潮流。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例如在香港、台湾、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美国、联邦德国等地区与国家连续召开国际性的“儒学学术讨论会”,外国学者关心与研究中国文化与儒学的人日渐增多。据1985年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一书所列出的全世界十大思想家,则以孔子为首位。1988年10月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孔子与世界”,这个课题本身就充分说明儒学的影响及其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范围了。在海外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了“儒教资本主义”、“儒教文化圈”的提法,更有西方学者提出:“以儒家伦理学说解救西方工业国家的精神危机”,“以儒家伦理调解后工业化国家的人际关系”等等,这表明儒学确实成为世界文化现象,儒学研究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面临新的形势与要求。

还值得一书的是国内一批爱国学者、文化人与生活在港、台地区的学者及海外的华裔学者,当一时阴云密布掀起“批孔”浪潮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自成一统,潜心著述,研究儒学,发掘儒学的文化价值与理想精神。梁漱溟先生堪称为这批爱国学者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后期著作《东方学术概论》、《人心与人生》等都是在资料被毁、比较险恶的环境下撰成的。熊十力先生晚期的著名著作《原儒》,也是在50年代后期比较“左”的政治环境下著述并出版的。另外,如范寿康、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张君勱诸君也都在同一时期研究儒学,并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陈荣捷、杜维明、刘述先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研究与传播,同样也提出过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做过有益的工作,杜维明的《人性与自我修养》,刘述先的《当代新儒家的探索》等著作,为儒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时代,开拓了新的思路,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我们正是在这些儒学研究取得新进展、新成就、面临新形势、新要求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对中国传统儒学做出全面、系统的研究、评价与阐述，说明儒学自身的一些根本理论，同时也迎接来自各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开始《中国儒学史》的撰述工作的。经过作者几年的查阅资料、努力挥毫、相互切磋，终于完成了此书。

中国儒学史是一部专业性学术史著作，也是一部比较专门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著作。由孔子所创立并在历史上得到发展的儒学，是以孔子为宗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经典，以仁、义、礼、智为基本思想的学术体系。它在战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显学，是绵延时间最长，对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影响最为深远的的一个学派。韩非子在概括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时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

儒、墨两家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最先形成的两大学派，孔丘和墨翟则分别是这两派的学术领袖。孔子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又《礼记·檀弓》云：“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蓄蕃息。”后来研究古代文化，招收弟子，开创私家讲学之风，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与文化工作，整理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删诗书，修六艺，创立了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学派，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思想体系。孔子奠定了早期儒学的理论基础，其思想资料主要见于《论语》以及《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等经书，《左传》、《国语》等史书，《孟子》、《荀子》等子书。由于孔子的渊博知识和高尚的文化素养，在当世已被人们誉为“圣者”。然而其思想不被

诸侯国的统治者所采纳，他在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途中甚至遭“陈蔡绝粮”之苦，被人讥讽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孔子一生虽然安贫乐道，但是提倡积极进取精神。曾谓子路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世时，其学说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传》）。

儒学在战国初期有所发展，但并未广泛流行。到战国中后期，由于孟轲、荀卿的阐扬与发展，遂成为显学。但是，由于孔门弟子众多，对夫子之学“取舍不同”，各执一端，使儒学内部发生了思想分化。韩非子在总结这一历史阶段的儒学发展演变时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篇》）

这八派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为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本来在孔子思想中最注重的是“仁”与“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孟氏之儒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强调心性和内圣；荀氏之儒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强调礼法

与外王,对后世儒学的发展、演变,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孟氏之儒与荀氏之儒各有取舍、走向不同,成为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内部思想观点对立的两大派别。从传统儒学的观点出发,韩愈谓孟氏之儒为“醇乎醇者”,谓荀氏之儒为“大醇而小疵”。(《读荀子》)

秦汉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与变化: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初步形成,思想文化由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开始演变为经学,成为地主阶级当权者的正统学说。如果说先秦的儒家是“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学术文化的话,那么西汉以后的儒学则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工具。先秦儒学是原生儒学,或称早期儒学,两汉以后,儒学为了迎接外来文化与本土异体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为了服务于地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不断进行内部调整与修正,甚至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如果说先秦时期存在儒家学派的话,则西汉以后只有儒学的演变。根据我们群体的研究,把儒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衰落的全过程相对地划分为下述五个历史时期:先秦为儒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儒学经学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玄学化和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期;宋明为儒学理学化的时期;清代为儒学衰落的时期。这既是儒学全史所呈现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也是本书总体结构的宏观理论框架。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的开放体系,从表层结构来看,它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流的深层结构分析,自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至少在战国末期的荀子思想中,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综合发展的趋势日见明显。汉代儒学皆经过荀子一派的直接传授,与先秦早期儒学相比,思想更为杂驳,儒学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历史上有人把汉代的儒学称为“新儒学”。两汉以降,由于中国

本土道教的形成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遂使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儒学与道教、佛教三种文化既互相排斥,又相互渗透,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儒、释、道三教(本书沿用“三教”的提法,但认为儒学非宗教)鼎足局面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韩愈等儒生们的力排佛、道,重振与复兴儒学,又经过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张载)、朱(朱熹)等人的努力,至两宋时期,儒家文化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理论形态,通常把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为“理学”(也有人叫做“道学”),或“新儒学”。如果把宋代以后的儒学与先秦时期的早期儒学相比较,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早期儒学(如孔子)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一般都是排斥道家与法家的,然而,宋代以后的儒学在许多重要方面却吸取了道家、法家思想文化和佛教思想文化。整理儒学的历史资料,研究儒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正是本书的根本宗旨。

胡适 1917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所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曾就儒学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他说:

除了这两个学派(指宋学与明学),儒学久已消失,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曾经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先秦名学史·导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年第 1 版)

这是关涉儒学的历史命运与如何对待儒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的

根本性问题。胡适正确地指出,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还清醒地看到,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学派中的一派,只是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这些提法都有助于否定传统儒学的经学地位,启发我们客观地评价儒学。但是胡适归根结底没有能力科学地估计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命运。他提出的所谓“儒学的被废黜”,很难说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实际上,儒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两千余年,发挥着它的历史作用,它已经作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载入历史史册。今天的任务,不是废黜不废黜的问题,而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与确定“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弄清它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特别应当站在时代精神的前列,分析它的得失,对它做出科学的历史总结与公正的历史评价。这是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任务。

儒学在历史上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且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除了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儒学本身的内在原因。儒学的基本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原始社会末期某些氏族公社残余意识的再现,它反映着宗法社会的血缘关系,因而又能深深地植根于宗法小农社会的土壤之中。儒学的基本概念是“仁”与“礼”。孔子对仁的主要界说是“仁者爱人”(《论语·学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可见,儒家的基本追求,是塑造具有忠恕之德的高尚人格与和谐的理想社会。而仁和礼这些伦理范畴的实质正是调解社会关系,和谐人际关系,以达到仁政清廉,社会稳定。忠、孝、节、义,不过是仁和礼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运用而已。儒家为政治伦理型文化,他们的这些主张,不但能为统治者所利用,而且也能被统治者所接受。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它的纲常名教,既可以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它的民本主义,对人民疾苦关心,又可

以达到某种程度上限制统治阶级过分剥削的效果。儒家提倡的“仁政”，不但被几乎历代统治者宣布为施政的目标，而且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幻想与精神寄托。至于儒家把道德培养看作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提倡，则是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高扬，成为催人奋进，勇于向上，追求真理的精神力量。儒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不但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它的某些思想内容又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和习性，它对于团结和融合各个民族，起过非常重要的向心与凝聚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在叙述儒学的历史演变时，不仅论述了汉族儒生对儒学的研究与发展，更对于儒学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通，进行了挖掘与研究。这不但表现于有关章节，而且特设专章（第四编第四章）进行论述。在今天，儒学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国界，它的优秀部分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但被东方的一些地区和国家所信仰，而且也为西方的一些地区和国家所接受。它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形态。世界各国学者研究儒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发现其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人类智慧沉积。近年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欧美各国不断增设儒学与东方文化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国际性学术讨论会。这些事实说明儒学研究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性学术潮流，它向每位儒学研究者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它要求回答：中国的儒学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占据何等地位？儒学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处于怎样的关系？儒学在人类文明与文化进程中起何种作用？儒学的历史命运如何？儒学能否复兴？等等。半个世纪以来在海内外流行的新儒家思潮全面肯定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与中国现代化不仅没有冲突，甚至还是不可缺少的历史动力，他们积极维护儒家的“道统”，宣扬儒学是人类最完善、最理想的文化。这是值得认

真探讨的严肃的历史课题。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积极提倡对儒学的反思，从儒学中寻找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模式，主张复兴儒家伦理等，也有值得赞许之处。近几十年还有一种以批判继承的名义实际上是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压迫或欺骗人民的思想工具，完全是历史的包袱，它不可能有什么历史的进步作用。这是缺乏科学分析的说法。实际上，儒学既有积极的思想精华的部分，即有利于发展现代精神文明，调整人际关系，增强道德意识与感情，推进现代化的部分，又有消极的思想糟粕的部分，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容的堕性心态，趋于保守的伦理和价值观念。中国儒学的积极思想，将成为创造未来人类高尚文明不可缺少的智慧元素和思想材料，成为诱发探索未来社会模式有价值的借鉴。特别是对于积极建设现代化社会的中国，对于后工业化国家所出现的道德失调、社会精神环境污染、家庭关系崩溃、人际关系冷漠、个人孤独等社会弊病，儒家伦理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调解作用，它既可以帮助和谐人际关系，又能在客观上适当稳定社会秩序。因此，我们应当对之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有鉴别、有批判地继承，既非无鉴别的全面肯定，亦非无分析的一概否定。

为了科学地总结与论述儒学文化遗产，还应该解决有关的方法论问题。唯物史观研究哲学问题时，往往习惯于把哲学思想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这是唯物史观中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物史观唯一的方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人在运用这个方法研究孔子或儒家思想时，犯过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把“唯物”与“唯心”的帽子不看对象地到处乱扣，结果不是阉割了某种哲学思想的多方面丰富内容，就是粗暴地对某些思想家下简单的结论。更有甚者，在一段时间里，有的人还概括